

Borrowed from
the Great Lump of Earth

An American Eco-Critic's Translation of Tang Poems

绿窗唐韵

一个生态文学批评者的英译唐诗

俞宁著



Borrowed from
the Great Lump of Earth

An American Eco-Critic's Translation of Tang Poems



一个生态文学批评者的英译唐诗

绿窗唐韵

俞宁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窗唐韵：一个生态文学批评者的英译唐诗 / 俞宁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325-7305-9

I. ①绿… II. ①俞… III. ①唐诗—诗集—英文
IV. ①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7564 号

绿窗唐韵

一个生态文学批评者的英译唐诗

俞宁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50,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978-7-5325-7305-9

I·2835 定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绿窗唐韵：一个生态文学批评者的英译唐诗》是一位美籍华裔学者的译作，它有三个特点，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它在选材方面还是下了功夫的。译者把《全唐诗》通读了两遍，从中选出了大约五百首以自然环境为中心主题的诗。其中的四百多首符合二十一世纪生态文学批评标准，被翻译成英文。译者又从中挑出一百一十五首，写了详细而又较有特色的译者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其余的三百一十一首，在美国另行出版。我们知道，歌咏自然的唐诗多如牛毛，但是译者根据当代生态文学理论，精选了能够给二十一世纪关心环境的读者们带来惊喜和启发的四百首，虽说不上排沙拣金，但确实是从《全唐诗》里四万多首中百里挑一得来的。

它的第二个特点是包括唐代文学专业研究人员在内的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译者是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英文系的美国文学教授，专攻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和环境文学作品的研究。他对西方以自然环境为主旨的文学作品和相应的批评理论有较深、较广的研究。同时他生长于北京一个研究

中国语言文学的世家，对于唐诗情有独钟。他能把西方较新的文艺理论运用在唐诗研究上，又从西方文学里找出了一些与唐诗相通的例证，是难能可贵的。他解读唐诗的角度和方法，值得我们参考。

第三是译者为我们提供的《引论》、《分类诗引》和《译者注》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些概念、重点和分析举例。这是他多年研究后的提炼，深入浅出，比较明快，便于借鉴。从他的理论概括和分析实例来看，译者的治学态度还是比较平实的。生态批评又叫绿色批评。译者的本意大概就是为我们介绍一副绿色的“眼镜”，帮助我们透过绿色的窗纱，来欣赏、学习唐代敏感的诗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感受。

我这里再稍作补充，介绍俞宁的学历。他于1986年曾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研究生，1987年入美国康涅狄克大学研究生院英美文学系，1993年被评为美国康涅狄克大学最佳研究生（全校每年只评一位），同年获英美文学博士。当年毕业后，即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担任教学工作，2005年被评为年度优秀教授。自1993年至2012年，发表有学术论文30余篇，参与编纂英语系专业教材3部。这部英译并评注的唐诗选，可以说是我们古典文学中外交流的很好方式，也可以促进中国读者对古典作品外译的欣赏。

傅璇宗

2013年夏

鸣谢

没有哪一本书是完全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总是借用了很多助力，是多方协作的结果。因此，当这本小书完成之后，我诚挚地对给予我助力的方方面面表示感谢。首先，感谢我任教的美国西华盛顿大学(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我校给我提供的研究假，使我能有一年的时间全身心地沉浸在唐人的世界，从四万三千首唐诗里爬梳出四百余首以自然环境为主旨的诗歌，翻译好之后，又再次筛选出这一百一十五首。我在校的职责是教授美国文学，校方能支持我研究唐诗，说明他们既有宽广的视野，也有灵活的政策。其次要感谢我读博士时的导师琳·布鲁姆(Lynn Z. Bloom)教授和她的丈夫马丁·布鲁姆(Martin Bloom)教授。二十多年来他们夫妇二人对我一家犹如亲人，并坚定地认为我们是布鲁姆家族的中国成员，对我的儿子也呵护备至，从小到大，既严且慈。他们还对此处选译的前十二首诗字斟句酌地帮我修改。我还要感谢诗人朋友詹姆斯·贝托利诺(James Bertolino)，他也帮我校阅了十几首诗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对这本诗集帮助最大、贡献最多的是我的好友、诗人卡罗斯·马丁尼斯(Carlos

Martinez)。他仔细听我朗读了每一首诗的英译并把他的感受反馈给我,使我能得到不熟悉中国文化的美国人阅读译稿时的感觉,并以此为鉴,进行微调。我们每周五对着一扎本地小酒庄自酿的啤酒讨论诗稿,其本身就是极富诗意的享受。对于卡罗斯,我除了感谢他的帮助之外,还要感谢他给我带来每周一次的美好时光。

在中国,我要感谢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时的硕士导师、已故的周珏良教授。他生前一再嘱咐我说:“学外国文学固然是好事,但千万不要把你的中文功底浪费了。”中华书局前总编辑、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唐代文学研究的泰斗傅璇琮先生阅读了部分译稿之后,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并积极向出版社推荐,并答应为我写篇序文。这使我在感激之余,还十分惭愧:晚学何能,竟得到先生如此厚爱!傅师母徐敏霞先生从中协调,转达信息,也给了我极大帮助。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社长王兴康先生热情地接受了译稿,现任社长高克勤先生关注稿件的出版,在此对两位社长和上海古籍社的有关同仁一并感谢。

最多的感谢,要奉给我的家人。在我学龄前,母亲就教我背诵唐诗。我虽不懂,却学会了欣赏铿锵顿挫的语音美。父亲在“文革”最困难的时候教我英文,为我日后走上外国文学的道路打下了基础。在我十二三岁,父亲被关进牛棚的日子里,伯父启功不但收留了我,而且耳提面命地教我唐诗。意想不到的是,他对我的“快乐教学法”,竟影响了我偏爱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趣味。我还能清楚记忆的有两件事。第一是有一天我在荣宝斋看到了一位王姓画家画的梅花,回家描述一番后,他说:“这画儿不太对。”这使我不解:画有好与不好之分,从何谈起“对”或“不对”呢?他的解释是,梅花儿生在雨水多的南方,花心儿朝下,像伞一样,俗称“罩水梅”。王先生把梅

花儿画得朝上，成向日葵了，雨水进入花心儿，很快就烂了。梅花儿没有那么傻。艺术不能出大格儿。儿时的我，喜欢模仿他诙谐的话语风格，于是我马上说：“好，那我就把‘草木有本心，不求美人折’改成‘梅花有本心，不肯朝天开’得了。”另一件是我背诵完初唐王绩的诗《食后》（本集选译），他问我：“楚豆是什么？”我说：“就是湖北一带的豆子呗。”他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说：“编！就知道你会编。”然后仔仔细细地对我讲：“那其实是牡荆的果实，可入药。不仅湖北，咱北京也有，叫荆条，叶子一对儿一对儿的。”我捂上耳朵说：“不听，不听，大爷念经。”他说：“我不念经，你懒虫一辈子也甭想知道什么是楚豆。”后来我在美国接触到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其中一个焦点是对“人格化”或“拟人”的讨论。这理论认为文学艺术是人在描写客观世界，所以总带着人的色彩甚至偏见，拟人也就不可避免，但一定要接近事物本身的情况。这就要求文学家、艺术家仔细了解事物的特性（见后文《分类诗引》关于 anthropomorphism 的解释）。也就是说，最低要求是知道楚豆是什么，较高要求是知道花朵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开放。伯父西去后，我还未写过怀念的文字。这里的回顾算是我心灵上的自我救赎，虽很短，但是，想让他知道，他的教诲，我年幼无知时虽貌似抵制过，实际上一直深深地记在心里。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我们十九岁时在建筑工地上相识，我当时是瓦工，她是油漆工。一路走来，快四十年了，我的每件事都和她分不开，这本小书更是如此。本来我只是为美国读者写的，打算仅在美国出版。但她把部分译稿请徐敏霞先生转给傅璇琮前辈看，在傅先生的鼓励下，我才想到把它献给中国读者。她使我避免了数典忘祖的错误，我在此感谢。妻的姐姐和妹妹都帮我吧译稿送出去打印过，我

也谢谢她们。

最后,我还要感谢读者。书,本来是一沓子用胶水粘在一起的纸。只有当读者打开它,把纸上黑色的或弯或直的符号在他们大脑里进行处理,纸才变成了书。也就是说,阅读是创造书籍的必要程序。读者诸君愿意和我一同创造这本书,我怎能不心生感激?另外,我的专业是美国文学,对中国文学是爱好,虽有基因遗传和家庭影响,但毕竟隔行如隔山,如有浅陋讹夺之处,望读者原谅。在此,我预先感谢您的宽容。

引论

诗人的语言有时会被人误解。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里说“大块假我以文章”(见《古文观止》，北京，中华书局，1978，页311)，原意是他诗文创作的灵感来自山川大地，文章是他暂时借来的，而其终极所有权归于山川大地。但人们将错就错，把“大块文章”当作对很长文章的调侃语。莎士比亚说：“文学当为世界立一面镜子。”(*Hamlet*. ActIII, Scene ii, l. 24.)不知何时起，人们便把这“世界”理解为人类社会，认为文学应反映人们的喜怒哀乐、政治斗争、经济纠纷、军事冲突、缠绵情意以及快意思仇。所以高尔基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定位为“人学”而不是“地方志”的一句话，就被炒作成了“文学即人学”这样的定理，一时间在文艺批评的圈子里变成了不二法门。这个见解，不够全面，而且有其不同版本的前身——中国文学传统里有人把“关关雎鸠”硬演绎成“后妃之德”，严格说，也是“文学即人学”理论必然导致的逻辑后果。谁能说在高尔基的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婆》里面，俄罗斯那广袤的草原、无边的森林和翱翔的雄鹰没有扮演重要角色呢？其中第一个故事里的男主角不就是鹰和女人所生的儿子吗？再者，莎翁所说

的世界,用的是“nature”一词,本意是“自然”,延伸意为“世界”。可是偏执的哈姆雷特,把它限定为“人性”(human nature),尤其是他自己设想的、自然表露的人性,从而摒弃了更大一些的自然世界。“nature”这个词,像李白的“大块”一样,包含了但不仅限于人类社会。任何人只要仔细想一想,都可以看出李白与莎翁对文学所下的定义,其内涵与外延都超过了把文学限定在人学之内的狭义文学观。万物在春天复苏、动物在此时求偶以图延续自己的物种;关关雎鸠如此,君子淑女亦如此。上古的民间诗人观照、讴歌人生的同时,没有忽略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是在他们的文学“镜子”里留下了各种生命息息相关的影子。如果把文学仅限定在“人学”之内,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孔子强调年轻人读《诗经》,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儒家“人学”内容之外,还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了(《论语·阳货》),也不好解释为什么一部《诗经》竟然包含了谷类二十四种、蔬菜三十八种、药物十七种、草三十七种、木四十三种、花果十五种、鸟四十三种、兽四十种、马的异名二十七种、虫三十七种、鱼十六种(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中华书局,1962,页2)。人不是孤立地活在世上的。我们的生存要靠种种其他生物的陪伴与支持;我们的生活和许许多多的其他物种紧密相连。文学研究工作者,在创建各种文学理论的时候,不应忽视了自然界在文学里的作用。这大概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在能源日减、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等环境危机的刺激下勃然兴起的主要原因。

那么,把二十世纪末产生的生态批评理论用于唐诗的研究与解读之中是否合理呢?换句话说,透过环境意识的绿色窗纱、戴上二十一世纪生态理论的眼镜,反过来解读、研究一

千多年前的文学作品是否合适呢？我觉得这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唐帝国的兴起，与当时的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公元八世纪上半叶，玛雅文化已经从其全盛期下滑了近百年，而拜占庭帝国的兴起还要等上大约两个世纪。唐帝国却在此时达到了巅峰，与阿拉伯穆斯林帝国并列，形成了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S. A. M. Adshead 指出，公元 600 年到 1000 年这段时间里，由于世界平均气候较温和而降雨量较高，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迅速，而在这个增长中，唐帝国的增长曾是最快的，同时唐帝国的人口也增长了 50%，从五千万达到了七千五百万(Adshead, S. A. M. *T'ang China: The Rise of the East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68 - 100)。这样的增长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是十分惊人的。所以大唐在领土扩张上雄心勃勃，对外交往上信心满满，国际贸易上十分活跃，科学技术上有所发展，文学艺术上更是欣欣向荣。盛唐时期的文学，一般被称赞为自由奔放，原创力十足，反映了当时生机勃勃的繁荣帝国，“形成理想主义的倾向和乐观昂扬的基调”(葛晓音，《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见《中国社会科学》，1985 年，第二期)。但是，当我重读唐代的四万余首诗作时，却发现在其纷繁复杂的各种题材里，诗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关心是无处不在的；他们仿佛直觉地感应到土地和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最根本条件，过度的领土扩张和经济索取，最终将反映到自然环境之上；诗人的灵感大多来源于山川大地；同时，他们认为，作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生活在世上就离不开一个适中的、可持续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帝国鼎盛时期的诗人也不例外。他们似乎意识到了，一个帝国的兴衰，也取决于这样一个人与土地、

人与自然的关系。唐代诗人的文学遐思和生活实践都反映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索和反思。他们的看法对我们今天生活在全球气候大变,空气污染、资源枯竭但经济仍然追求高速发展时期的现代人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基于这种考虑,我从四万多首唐诗中选译了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旨的一百一十五首。这一百多首唐诗的作者是三十五位诗人和一匹马。我为我的祖先认为马会作诗感到吃惊,更为一千多年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怀疑一匹唐代的马曾用唐人的语言作过一首抒情短诗而感到自豪。虽然我不能想象马作人语,但我深信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灵性。人与动物的心灵感应甚至友谊,也是在唐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从这样的想法出发,我把所选的这一百余首诗,从目前西方学者对于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所关心的几个焦点出发,撰写译者注,着重介绍新的生态批评概念并用它们分析作品,并涉及到当代学者的担忧和唐代诗人的遐思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严格来讲,诗的翻译是不可能的。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得做好妥协的心理准备。我只好根据自己对这一百多首唐诗的知性理解和感性体验,求意会不求形似。译成后把我的译文朗诵给我的好友——诗人卡罗斯·马蒂尼斯(Carlos Martinez)听,看看他所得到的理解和美感是否与我阅读原诗时所得的效果相近,再根据他的反应调整译文。因此,如果读者发现译文有些脱离了原文的“自由主义”趋向,我在此道歉并敬请原谅。这一百多首诗里,每一首都带有卡罗斯的反馈,所以我还想在此对他表示深深的感谢。

《圣经》里有句话说:“阳光之下并无新事。”在这部诗选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人与今人的契合之处,这说明生态环境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不因时间流逝和社会发展而改变。不论

人们自诩进化成何种“新新新新新人类”，总也不能脱离诸如阳光、土壤、空气和水这些基本自然因素的支持。但是，这不意味着“生态批评并无新意”，因为我们作为读者，对古人、今人一直关怀的而又由于人类生产能力呈几何级数式发展而变得越来越紧迫的人类“环境伦理”问题上做出何种应对，这才是一个后工业化社会的崭新命题，也是人类为自身生存繁衍所应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换言之，通过这些唐诗，我们可以感觉到，人类中最敏感的份子——诗人——早就在思考人类的环境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从远古带来，虽不新奇，但它们对我们生活乃至生存的紧迫压力却与日俱增。作为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我们如何应对这越来越紧迫的压力，就将引出阳光下的新事。经典物理学的第一定律是“万有引力”；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第一定律是“万物相关”（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如果我们能放下千百年来人类固有的偏见，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以平和之心善待自己的同类乃至世间万物，这将成为阳光下的新事。因为这有望把诗人们敏感而宽容的心怀普及到芸芸众生，收敛我们对自然过度的索取，从而使我们的生活与生存可以控制在自然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使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可以延续下去，使我们的儿孙可以在健康的环境里成长。

当年李白乘轻舟飞渡万重山时不绝于耳的猿声，与我们已经绝缘了；但是，如果通过我们的收敛，放弃某些豪华奢侈的物质消费，修补一些被我们损害了的自然环境，使得我们的子孙再访三峡时又能听到那久违的猿啼，那将是阳光下最大的新事。读古诗，做新事，不亦乐乎！

分类诗引

用二十一世纪的生态批评观点重新审视唐诗，就避不开一些二十世纪以后才形成的新概念，比如碳足迹、地域感、万物相通、自然的人格化、社会公正和环境伦理之关系等。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些概念和这里选译的唐诗确实有相当程度的默契。我在此处选出六个基本概念加以简单说明，并列出和各个概念相对应的诗歌。

（一）去贪奢、碳足迹和“放弃的美学”：在这里选译的唐诗里面，有不少诗的内容都提倡素朴节俭、克制贪欲。“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王维的简短诗句从形式上以少胜多，内容上弃大求小，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诗人不同意用“傲”这个字来解读庄子的行为，而是运用老庄本身的哲学思想，认为无大才方能够保全天年。一个收入不高的官职和几株微风中翩翩起舞的漆树足以使一个哲学家充分享受生之欢乐。这种思想在王绩那里更趋极致：“田家无所有，晚食以为常……鼓腹聊乘兴，宁知逢世昌。”“晚食”就是因为食物不足而不能按顿吃饭，拖到很晚才能勉强凑出一顿饭的原料，其中还包括了楚豆、葛花、松树皮这些人们

一般不吃的食材。从语气上听来,忍饥挨饿在诗人的生活中似乎是常态。他逃官归乡,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却丝毫不改乐观的生活态度:能把肚子拍出鼓样的响声,想必那肚子至少有一半是空的吧?拖到很晚才能吃个半饱,而王绩却把这样的日子看作盛世。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细读王绩诗后的译者注,结合他的身世和生活态度,更能理解古代哲人弃繁就简的思想基础。

王绩的修辞手法有些夸张。夸张固然是诗歌的特权,但诗人这样使用特权也反映了习惯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对流行思潮的一种抵制,即对初、盛唐高速发展时期所流行的进取精神的抵制。在当时多数人眼里,进取精神无疑是好的;但在我们这些后人眼里,少数唐代诗人质疑甚至批判所谓进取更是必要的,因为在当时,这样的反思可能缓解“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现状;二十一世纪,人类在进取了千年以后终于被自己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力所惊醒,忽然发现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所谓的进取给生存的环境所带来的巨大破坏。而计算这种破坏的计量单位就是“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这个概念,意思是我们每一年之中在生产、消费、交通、运输等诸方面所释放的二氧化碳量的总和。这个数字越高,说明我们的生态伦理水平越低,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有限,我们用多了,别人或其他物种所用就少了,持续下去的结果是有些物种会灭绝,在极端的情况下,会使我们的儿孙无法生存,那将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自我毁灭。

在唐诗里,我们很少看到宣扬奢侈挥霍的,却看到大量的戒贪促简的诗作。比如韩愈在《太平公主山庄》里批判讽刺了权倾一时的太平公主要把整个美好春光占尽的贪婪。与太平公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代的开国“明君”李世民。他也雅好

山水,但接受了隋炀帝的教训,把自己的这个高雅爱好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儒家传统里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唐太宗大概认为自己是仁者,所以要“启一围而建址,崇数尺以成岬”(《小山赋》,见《全唐文》卷四)。他大概也向往做一个智者,所以还要“引泾渭之余润,萦咫尺之方塘”(《小池赋》,见《全唐文》卷四)。白居易爱山水到了有“病癖”的地步。在《庐山草堂记》里面,他描述自己:“从幼急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簣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全唐文》卷六七六)。他还在《策林》二十一里明确提出“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并建议帝王“畋游有时,不徇己情,不穷己欲,不殫人力,不耗人才”(《全唐文》卷六七〇)。从唐太宗的“萦咫尺之方塘”到白少傅的“环斗水为池”,我们看到了与太平公主截然不同的山水观。至于韩愈自己,则如《盆池五首》所示,更喜欢小中见大。一个瓦盆、几尾鱼苗就能给他带来亲近自然的欢乐。在《观打鱼歌》、《又观打鱼》和《白小》等诗里,杜甫指责人们竭泽而渔的行为,担忧日后的物种灭绝,发出“暴殄天物圣所叹”的感慨,并质问人们这样“尽取欲何如”?相反,不“暴殄天物”,不“尽取”,就意味着人们得主动放弃一些东西。这首先是对某些物质财富和权利的占有。唐朝诗人几乎个个都是或大或小的官吏,其中不少人主动放弃官位和与之俱来的物质占有权,回到乡间,躬耕陇亩,去追求简单纯朴的生活。这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家劳伦斯·布尔(Lawrence Buell)看来,是“放弃美学”中的第一种追求(见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44)。布尔的放弃美学还有另一条路子,就是干脆放弃自身作为独立于自然的人类主体身份,